

黄 岩 著

全球化与中国劳动 政治的转型

来自华南地区的观察



政治与公共事务论丛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ABOUR POLITIC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S IN
SOUTH CHINA REGION

黄 岩 著

全球化与中国劳动 政治的转型

来自华南地区的观察



上海人民出版社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ABOUR POLITIC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S IN
SOUTH CHINA REGIO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全球化与中国劳动政治的转型:来自华南地区的观察/黄岩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政治与公共事务论丛)

ISBN 978-7-208-09691-2

I. ①全… II. ①黄… III. ①劳动政策—研究—中国

IV. ①F24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8491 号

责任编辑 徐晓明

封面设计 王小阳

· 政治与公共事务论丛 ·

全球化与中国劳动政治的转型

——来自华南地区的观察

黄 岩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3.75 插页 5 字数 201,00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691-2/D·1819

定价 26.00 元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与背景	1
第二节 文献回顾	6
第三节 论述框架	17

上篇 外来工、资本与地方政府

第一章 权益缺失的群体：外来与流动	23
第一节 汹涌民工潮：向往南方	24
第二节 离土又离乡：现金饥渴	26
第三节 工资与工时：自我剥削	30
第四节 工伤与职业病：身体的价格	35
第二章 地方政府：保护与断裂	41
第一节 工伤补偿：资本与地方权力的合作	42
第二节 暂住证收费：利益分享链	54
第三节 社会保险：政策的精密化	60
第四节 从“盲流”到“产业工人”：政策进步	66

第三章 弱者的反抗	72
第一节 仲裁机构的招牌被摘了	73
第二节 跳楼跳桥与堵路秀	75
第三节 暴力报复与自杀自残	78
第四节 软反抗	79
 第四章 脆弱的团结:台兴工人的抗争	83
第一节 台兴事件:骚动的权利	84
第二节 生存威胁:有限团结的根源	87
第三节 脆弱的团结文化	99
 下篇 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工团结	
 第五章 跨国网络:劳动政治的全球化	109
第一节 全球化对中国劳动政治的挑战	110
第二节 跨国网络在中国的行动	114
第三节 台兴抗争的跨国扩散	121
第四节 跨国网络的倡议效应	124
 第六章 外来工组织:劳工自救的开始	128
第一节 外来工组织的成长	129
第二节 “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CO)与跨国网络	135
第三节 外来工组织的制度化和机构化	141
 第七章 员工委员会:产业民主的一个探索	145
第一节 产业民主与劳工参与	145

第二节 兴达试验:员工委员会	148
第三节 车间政治与生产政治	150
第四节 劳工参与:凝聚团结意识	153
第五节 工人自我管理的有限性	162
第八章 工人协会:自我赋权	168
第一节 苦难的诉求	170
第二节 漫长的筹备会	174
第三节 来来往往的支持者	179
第四节 协会的发展与壮大	183
第五节 走在十字路口	187
代结论 政策展望	194
参考文献	200
后记	206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与背景

2009 年 12 月 16 日,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奖揭晓,来自中国深圳一家电子厂的一群普通工人以“中国工人”为名集体登上年度人物榜。《时代》周刊的发榜词写道:“中国经济今年能够成功保八,归功于数以千万计背井离乡的中国工人”,“正是这些男男女女他们过去的奋斗,现在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看法,引领着世界走向复苏之路”。



图 1 美国《时代》周刊 2009 年度人物——中国工人^①

① TIME: “Person of the Year 2009—The Chinese Worker,” Jessie Jiang, from 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article/0,28804,1946375_1947252_1947256,00.html.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依托海外资本,中国华南地区兴起了大量的出口加工区、工业区、工业园等,它们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数以亿计的打工仔打工妹,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这种外向带动战略推动了中国保持连续二十余年的增长。学者们在研究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时候更多地强调这种出口导向经济政策的成功,外来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承载着现代化转型的巨大痛苦却往往被忽略。

劳动政治与社会转型紧密相关,进入现代资本主义时代,工人越来越被边缘化,成熟的资本主义创造了劳动力的碎化,技术的进步侵蚀了传统的蓝领制造,泰罗制管理方法的采用有效地抑制了工人可能具有的创造性意识,传统的工人阶级正在日益消亡,一种“非工人的非阶级”或称“新工人阶级”开始取代工人阶级。^①或者说,工人正在从政治舞台隐退,不再是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在西方学界这种状况被称为“双重危机”,即劳工运动本身的危机和劳工研究的危机。^②

但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种阶级转型与西方工业社会对阶级的判断有许多不同之处。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都陷入了全球化的漩涡。当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日益沉寂时,转型国家的产业工人队伍却在逐渐壮大。当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遍布全球时,也就意味着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在中国形成了。

1949 年以后三十多年的中国社会,阶级标签被用作政治动员、个人生活机遇及社会身份分配的工具,直到 1978 年国家提出改革开放战略。随着市场化改革和产权的重新调整,新的社会不平等出现了。外来资本和私人资本不断进入生产领域,国有企业进行重组和改造,不同的所有制产生了许多新的劳动用工形式,如合同工和临时工,农村的市场化改革解放出大量的劳动力,于是一个新的劳工群体出现了。这个新阶层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及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学者李静君看来,“工人转型”的核心是重新确立作为一名中国工人的物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理论与现代社会学》,赵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96 页。

② Silver, B. J. *Forces of Lab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2 期。

质、法律和道德界标的过程。

学者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否的论争曾经遮蔽了阶级话题,右翼学者更关注市场的推进、精英角色以及产权改革和私有化运动等话题,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臬,他们崇尚的是市场的自动生成和丛林法则。^①而左翼学者更关注社会贫富分化、分配公正等问题,中国思想界面临这场“大转变”时显然还没有找到一种共识,因而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论争也就变得不够深入。自由主义者认为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社会没有彻底地贯彻自由市场原则,工人、农民、工会主义者构成了一个“反自由主义的合谋”,化解人类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进一步坚定地迈向自我调节的市场。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这是“一场新型的保守革命以进步理性和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为掩护,它正使市场意识形态的复辟正当化”^②,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大萧条等经历促使学者开始反思自由主义思想的后果。左翼学者波兰尼提出,危机的根源在于那个建立自我调节市场的努力本身就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乌托邦,只要自我调节市场的原则占据支配地位的一天,社会的自我保护或反抗就不可避免,“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意味着一个十足的乌托邦。在不消除社会的人性和自然本质的情况下,从时间上来说,这种制度根本无法存在,它在物质上会毁灭人类并把人类的环境变成一片荒野”^③,所以任何一个建立不在外力干涉下运转的自我调节市场的企图都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

布尔迪厄发现,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之后,世界面临着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和全球化转向的严峻挑战,诸如恐怖主义流行,民粹主义泛滥,贫富分化加剧,怨恨歧视和社会性排斥增加以及社会整合消解等等。布尔迪厄认为造成这些“世界的苦难”的主要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撤退”政策。布尔迪厄看到,当代政治领域逐渐走向封闭,各种常规化的政治仪式和科层化的政治操作已经遮蔽了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且不断积累的歧

① 如新自由主义者张维迎提出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记者潘圆:《经济学界“左”派“右”派握手》,《中国青年报》2006年2月26日。

② Bourdieu,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Socialist Review*, 2000 Issue 242.

③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视、怨恨和苦难。政治领袖们被一些乐意借助于民意调查的巫术进行治理的技术官僚所左右。这些人对公民日常生活缺乏了解,通过貌似科学的手段和集体性话语制造出掩盖社会疾苦的政治幻象。布尔迪厄还对当下知识分子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一部分知识分子陷于沉默,另一部分热衷于到处抛头露面,喋喋不休地讲着人们不愿意听也听不懂的套话,“这实际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的自主性”^①,有学者把这种研究现象归结于学术研究的“国家暨管理取向”,底层阶级“甚难因为研究者的介入而取得发声机会,反倒每每沦为国家、资本家所共同凝视的客体对象,故批判的社会研究潜能遂变得难以开展”。因此这种“国家暨管理取向”的学术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只不过是“环绕着国家与资本的周边卫星位置进行学术代工”。^②在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模式的指引下,学术研究已经没有数量上的忧虑了(想想今天的课题满天飞),但学术研究的批判性传统正在被阉割。

布尔迪厄提到的问题也是当下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市场改革20年摧毁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前资本主义的互惠经济,社会底层已经无法用传统阶级话语来建构自己的认同。在全球化和市场化主导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去思考如何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也应关注底层公众如何在“社会保护”之下获得生存的空间。

本书使用的“外来工”一词通常还被“农民工”、“民工”、“打工者”、“盲流”、“打工仔”、“打工妹”等所替代,这一群体的规模到2006年已经达到1.2亿。^③自1989年民工潮第一次出现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要想对“外来工”一词下一个明晰的定义还比较困难,原因并不在于学科争议,而在于这一名词的指称对象处在不断的变化中。户籍制度、地缘、职业甚至语言等因素在不同的情境下可分别用来界定外来工。来自外地、从事非农产业、工

① Bourdieu et al.,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Polity Press, 1999. 毕向阳,《〈世界的苦难〉:它的缘起、观点与方法》,载李友梅、孙立平、沈原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吴挺锋:《台湾外籍劳工的抵抗与适应:周休作为一个斗争场域》,《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秋季。

③ 数据来自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文件。

作权益没有保障三者是外来工的普遍特点,他们一般没有当地户籍,大多数来自农村,也有一些来自城镇下岗或效益不好的单位,一些工人也具有城镇户口,他们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打工,其打工权益没有保障或经常受到侵犯。

官方的文件对这一群体的称谓已经摆脱了零乱,国务院在2006年一号文件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使用“农民工”称呼,“进城务工人员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说明这一群体在政治上开始受到尊重。^①官方使用“农民工”一词表明了国家政治系统所需要的一种话语宣传,它能方便地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类对接,但这只是一种政治身份识别,却忽略了这个群体的属性。事实上这一群体之所以沦为弱势,不一定在于它的农民职业,而更在于它的外来属性,他们不属于沿海地区,没有当地户口,没有流入地城市户口,他们可能是农民,也可能是国有集体企业的下岗工人,还可能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学生,因此笔者更强调这一群体的外来属性以及由这种外来属性所导致的分裂性和流动性。考虑到外来工中的大部分来自农村,在本书中“外来工”与“农民工”可以互相替换。

西方劳工社会学有“老工人”与“新工人”的划分方法。布尔迪厄在对法国北部索绍地区罢工观察中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新工人没有老工人的团结意识,工人中间充斥着不信任和躲躲闪闪的暗地行为,“以前的工人都是比较一下工资多少,确认有无错漏”,而现在“他们都是拿着自己的工资条躲在一个墙角偷偷地看”,“工人之间的团结、工作群体的再组织潜力都遭到破坏”,“新工人缺乏政治意识,缺乏统一的集体性政治语言”。西尔弗也认为,“老工人”是指那些经过长久斗争、建立起自己工会组织并从资本家和国家那里获得一定权益的工人阶级;“新工人”则是指近年来进入生产过程中的工人,他们缺乏自己的组织,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因而

① 《国务院研究室称农民工称谓是经反复研讨后确定》,2006年3月28日。<http://news.sina.com.cn/topnews/head20060329.shtml>。国务院研究室认为从四个方面考虑采用了“农民工”这个称谓:一是采用农民工称谓,既能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也能包括异地或就地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二是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三是这一称谓已经约定俗成,比较准确,比较贴切;四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文件中都使用过农民工称谓,也有依据。对农民工歧视与否,不在于使用什么样的称谓,关键在于实行什么样的经济社会政策。

权益是受损的。^①如果以斗争能力来作为分析变量,中国产业工人的划分将会变得十分零乱和复杂,借鉴布尔迪厄和西尔弗使用的概念,我们也可以把传统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称为“老工人”,把全球化和市场化改革之后脱离原来生产领域和户籍地的这个外来工群体称为“新工人”,本书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国华南地区外来工这个群体上。

在强势资本面前,中国外来工如何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跨国网络为中国外来工的维权行动注入新的元素,外来工是否能像资本全球化流动一样与其他国家的产业工人形成“一种全球化的工人团结”?本书将通过大量材料来展示中国外来工抗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还将对全球化下的国家和资本的角色进行分析,国家是如新自由主义所言的“撤退”还是一如既往地扮演其父爱角色?抑或国家本身已经是一种侵蚀力量?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议题:外来工的抗争具有哪些方式和特点,公开的抗争运动在中国为什么会走向失败,如何看待全球化对中国外来工抗争产生的影响。在这些议题的背后,本书将进一步厘清抗争过程中外来工的阶级意识是如何凝聚的。

第二节 文献回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来工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来工的权益保障、受损地位修补、外来工职业和身份特性、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外来工的社会资本、外来工的政治文化意识、外来工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外来工的身份转换和自我认同等方面。这些研究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但在政治学领域还没有针对这个群体的阶层意识和抗争特点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学术界已经开始使用“维权”这一用语来分析国内社会现象,应星、于建嵘、李连江等用来分析农民的集体行动,陈峰、刘爱玉等用来分析下岗中的工人集体行动,石发勇、张

① Bourdieu et al.,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ilver, B. J., *Forces of Lab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磊、郎友兴等用来分析城市社区的业主维权或环境运动。

面对这支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的崛起,学术界开始思考必须重新回到以阶级为中心的分析体系中来,学者沈原依此提出“把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研究推向中国社会学理论框架的中心地位,不是个人理论偏好的作用,而正是转型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实践逻辑所提出‘真问题’的使然”^①。在这之前,两位女性学者李静君和潘毅对中国外来工这个群体阶级意识的形成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②

在总结中国改革成败问题时,李静君在《中国工人阶级转型政治》一文中批判了学者们专注于精英分析而忽略了产业工人这个庞大群体的作用,中国改革的成功最后往往被学者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功,而且这种成功更坚定了学者们对市场迷思和“国家的撤退”的立场。但李静君却认为,对于劳工而言,改革更多地意味着出现一个阶级冲突、道德困境和经济混乱的过程,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体验与前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承相结合,在中国劳工的一部分片断中生产出强烈且高水平的阶级意识。李静君把中国“工人阶级转型”分为三种模式即流动农民工的形成、下岗工人的消解和社会主义工人的再造。在这三种模式中,国家都作为关键行动者,其支配性工程改变了劳工状况的整体性,并开启劳工反抗和实践的新渠道。李静君肯定外来工通过罢工和法律诉讼争取权利的斗争方式,但她继续指出外来工的斗争会受到其自身的一些“惯习”影响,外来工凭借有限的资源要向上流动进入城市必须克服多重困难。他们能够辨识直接面对的敌人,地方权力体系、政府官员和资本方经常成为地方性劳工斗争的目标,但不可能反抗(他们也迷惑于)全球化和市场自由主义的抽象力量。李静君的论述开辟了“把外来工带回分析的中心”路径,为学者探索外来工阶级意识形成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李静君非常重视三个群体转型中的国家角色,但她对三个群体的划

①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② Lee, CH K., From 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 Changing Production Regime in Chinese Factories, *China Quarterly*, 1999, 157; 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Pun, Ngai., Becoming Dagongmei: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Reform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42(July, 1999): 1—9; 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

分略显简单,农民工和下岗工人这两个群体存在着很大的重合性,而社会主义工人已经越来越没有样本代表性,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随着产权制度的推进,所谓社会主义工人已经很少存在了,劳动合同制和股份制、公司制改造已经把这批工人抛入市场的汪洋大海,而且李静君一方面强调国家意志在重塑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同时,又肯定了工人能够借助于国家意志如法律诉讼对抗资本和国家,李静君对市场化下的中国地方政府角色没有进一步的分析,尤其是没有分析到资本和国家共谋的影响。

另一位香港学者潘毅以自己的亲身打工经历来阐释另一种分析方法。她重点关注华南地区的女工命运,从而提出“抗争的次文本”概念。潘毅认为中国打工阶层声音不仅仅被地方政府建设现代化的轰鸣声所湮没,同时也遭到了普通民众(不仅是城市新兴中产阶级,有时甚至包括外来工自身)的普遍反感和憎恨。尽管当代中国尚未出现以对抗国家与资本为目的,既有组织又有系统的集体性阶级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急剧变革的中国社会没有出现阶级意识的萌芽。

潘毅认为在当代中国,新的精英集团自觉地对抗着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以及特殊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话语,因为这些话语仍然有可能塑造大众的记忆。潘毅通过工厂女工的研究发现“阶级意识”可以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它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表现出来,而且其“阶级意识”几乎不比任何集体性阶级斗争时候弱小。在车间,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能够普遍而灵活地传播和使用凝缩技术(condensation)、置换技术(displacement)和再现技术(representation)等表述政治,而且通常性别、族群以及城乡地位等话语交织混合在一起使用,没有“阶级斗争”并不意味着没有“阶级意识”和“阶级”。国家和资本结构性的压制,户籍制度与由此制造出来的劳动力控制机制形成一种特殊的权力形态,建构出外来工模糊的身份认同,从而既深化又同时掩盖了对他们的剥削,无形中抑制打工阶级的形成,身份认同的模糊性有助于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供应数量和弹性。

潘毅把关注的重点进一步集中在女工身上,因为“敏捷而灵活的工人身体则通常被描述为年轻的、单身的、女性的并且尤其适合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打工妹作为一种新身份,作为一件文化产物,恰好地在全球资本主义机器开到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进行收割的这个特殊时候被创造出

来,它标志着一个由市场、国家和社会共同影响无产阶级化的新时期的开始”,然而“打工妹既远非一件简单的文化产物,更不是权力和论述的结果,也不是一种性别构造”。作为一个以各种形式的合作、反抗以及挑战为特征的特殊底层阶级,她们的社会抗争不应该被简化为传统的“阶级斗争”,因为它并不是传统意义所界定的那种工人抗争,她们的社会抗争既是打工者对制度和资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①

潘毅把中国女工置身于全球化产业背景下进行分析,以细腻的笔调描绘了这个群体的抗争意识的形成,但是潘毅对女工斗争的分析略带悲观,而事实上女工的反抗并不一定比男工脆弱,而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差异。

潘毅对外来工的阶级意识分析继承了汤普森的分析传统,汤普森认为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历史时期自我形成时考察,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②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汤普森精致地分析了英国阶级意识的形成,他反对那种把阶级形成看作是结构—化约主义的产物,他强调文化和制度在生产过程内外形成人们“亲自经历的体验”的作用,这是一种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视角,欧洲工人阶级成长应该包括以下几个要素如手工业文化与技术工人的高度团结力量(美国学者裴宜理在分析中国20世纪30年代上海工人罢工时也持同样的看法)、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影响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自由等理念、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力等等。

韩国学者具海根在《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一书中借鉴汤普森的观点,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分析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具海根发现,比照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史,韩国工人阶级是在一种极其不利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诞生的,韩国工人阶级缺乏浓厚的手工业文化传统,他们是作为被原子化和被改变生活方式的工人而纳入新工业制度当中的,除了家庭或血缘关系圈之外没有集体感。韩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话语环境对工人阶级的形成更为不利。韩朝分裂以后,具有战斗性的左翼工

① 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

② [美]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会被右翼力量和军事政府彻底摧毁,劳工动员被视为共产主义鼓动,由于担心被贴上同情共产主义的标签,直到今天韩国仍然没有任何政党谋求工人的认同或对工人阶级运动给予组织上的支持,影响韩国工人感知工业经验的主导语言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其中包括着民族主义、家庭主义和国家安全等,工人的辛勤劳动和牺牲被称为爱国行为,工厂工人被称为“产业战士”。通过教育计划,国家大力宣传勤勉、忠诚和谐的儒家伦理。

那么韩国工人是如何能够克服这些文化和政治障碍并铸就一种强大的工人认同的?具海根认为韩国工人克服受鄙视的“劳动者”形象如“孔多里”(打工仔)和“孔顺尼”(打工妹),这种文化形象和国家强加的“产业战士”标签形成他们自己作为工人的集体认同方式,具海根没有把笔墨停留在探讨韩国工人阶级最终形成的时间上,与汤普森的看法相似,具海根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的动态过程,“阶级总是处在形成和消失、进化和退化的过程中”,与韩国大多数学者把分析重点放在劳工战斗性不可避免和威权主义国家对劳工镇压等方面不同的是,具海根强调“不要假定以共同阶级认同为基础的阶级行动会自然从国家领导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

具海根认为,韩国劳工战斗性和工人高度政治意识的最终根源是工厂中极度滥施权威和专断霸道的工作关系,尤其是女工,她们不仅受到经济上的剥削,而且受到文化和符号的压迫。20世纪70年代分散爆发的工人抗议是高度情绪化和以道义为依据的,“某种公平的道义感在决定工人对他们的无产阶级工作关系的反应方面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抗议是无组织的,自发的和防卫性的”。但是进入70年代末期以后,韩国工业主导模式发生了变化,工人队伍大大扩张,空间集中性更突出,更重要的是活跃的政治运动开始与基层劳工斗争相结合,受到进步主义神学影响的教会组织利用他们的国际网络和相对安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地位为劳工活跃分子提供指导和庇护,高度政治化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工作场所的抵抗运动联系起来,大学生纷纷掩护起真实身份进入工厂,帮助工人提高斗争觉悟和组织能力。正是工作场所和市民社会发生的这些文化和政治的矛盾效应推动了劳工战斗性和阶级意识的快速提高。^①

① [韩]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梁光严、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在具海根之前,另一位劳工政治学者戴约(Deyo)对东南亚地区劳工特点进行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在东南亚地区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这一地区的劳工一直扮演着被动和顺从的角色,戴约看到:“在国家事务中,组织化劳工在政治上只起到边缘性的无关紧要的作用,产业罢工情况很少发生,而且普遍容易压制下去。”戴约归纳了三种解释路径:第一种是文化上的解释,儒家文化及等级制、尊重权威、合作、勤奋、家族主义等被普遍认为起到了鼓励工人服从和与管理者合作的作用,它们对工人的团结和集体行动起到了阻碍作用;第二种解释是经济上的,东南亚“四小龙”快速增长大大提高了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它削弱了工人集体行动的动力;第三种解释集中于国家的作用方面,这一地区强大的政府严密地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家统治精英将经济增长确定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并以此来获得公众的支持。^①

戴约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了韩国工人的反抗与东南亚地区的异同,他认为这是由于工人阶级的不同结构特征造成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制造产业通常是由一支女工主导、结构弱小的劳工队伍支撑的;而重工业则由男工主导,结构上比较强大,韩国重工业发展迅速,在地理和组织上更加集中。这被称为“结构能力”的差别,戴约认为正是这种结构能力造成了东南亚地区劳工战斗力弱小。

对于东亚国家中不同的经济形态和不同的历史所导致的工人抗争性差异,上述三个方面解释还值得进一步讨论。比如,在韩国,反抗国家控制的全总工会,要求组建独立工会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同样在经济形态上,出口替代为主时期显然与重化工时期的工人构成特点有所不同;在中国,庞大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其中主要是女工,这可能会削弱工人的斗争意志;不同时期外来工流动也与中央对农村的政策调整有关,自中央免除农业税后,农民外出打工热相对减弱;在韩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女工和男工的劳动力市场需要不一致,反抗队伍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类似的“结构能力”的差异表现如新一代农民工队伍的壮大,他们已经与父辈完全不一样,其意识可能更积极主动,也没有背负父辈沉重的生活

① Deyo, Frederic, *Beneath the Miracle: Labor Subordination in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